

2110

隆昌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八月

政协隆昌县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胡成章 李国良 郑科 夏昭承

分管领导 丁晓弟

副主任 赵嘉桢 邓介人

委员 蓝长林 陈钟麟 吴晓英 蓝庭鸿

余盛渊 余策彭 张培宗 冯志荣

杜厚望 许祖辉 江定川 杨书成

杨存道 左宗模 张隐秋 张荣德

袁隽川

专职干事 石小东

目 录

怀念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赵洪滔县长·····	蓝家灿 (1)
关心干部群众疾苦的县委书记徐永志·····	陈 清 (7)
唐朝选先生事略·····	唐传英 (12)
忆大哥喻智微·····	喻智渊 (22)
农业科技推广的回顾·····	王民治 (30)
隆昌县水利工程建设与干旱防治·····	江定川 (37)
隆昌蚕桑业的由来与发展简介·····	聂光文 (48)
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	张汉儒 (62)
隆昌银行储蓄事业蓬勃发展·····	方名雍 (73)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在隆昌的实践和成果·····	黄志海 (80)
隆昌县交通事业的发展概况·····	
·····邓睦华 蓝胜才 蓝庭鸿	(86)
石乡文化探微·····	冯志荣 (94)
隆昌卫生院始末·····	周道平 谢卿富 (104)
隆昌卫生事业四十年来的变化·····	陈德方 (107)
五十年代初隆昌宣传工作纪实·····	许祖辉 余盛渊 (113)
明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	曾昭华 (127)
峰光半月刊·楼丰校刊·楼丰合作社·····	唐传英 (131)
我在隆昌一中打成右派的前前后后·····	刘鹤年 (137)
《抗日时期冯玉祥在隆昌县号召献金救国情况》	
一文的更正和补充·····	林贵华 (142)

怀念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赵洪滔县长

蓝家灿

每当年纪稍老的同志们谈起领导作风时，谈起领导与一般同志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的要谈起解放初期县的一些领导同志，他们老八路的优良传统，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作风，与群众同生活、同劳动、同商量的作风，他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踏踏实实，艰苦朴素的作风，令人深深怀念，特别是赵洪滔县长。

赵洪滔，隆昌县第四任县委书记，第五任县长，原一四三团副参谋长，后调任泸州、宜宾专署副专员、广西体委副主任。赵县长没有县太爷的官架子，他处处置身于劳动人民中间，关心群众，热爱群众，虚心请教，平易近人，对一般干部、农民、普通老百姓都亲近、和睦、友爱、热情。他虽与世长辞了，但他在隆昌的一些情况，至今仍使我难忘。

1951年12月六届一次县各代会上赵洪滔同志当选为隆昌县长后，该年冬季即遇上严重干旱，水田断水。坡地小春作物枯黄，县根据川南区和专署指示，县政府成立生产抗旱办公室，后旱象日益严重，抗旱办公室改为生产抗旱指挥部，赵县长任指挥长。我与郭一两人参加办公室搞具体工作（3—4月才又从县供销社调邱太禄来工作）。

抗旱办公室成立后，赵县长十分重视，每天必到办公室

来看电话汇报记录（每日各区、乡都必须电话汇报），每天晚上必听我与郭一汇报当天各乡的情况和经验、办法，有突出的即布置我们拿人下去看看，总结、研究，具体指导，当天下去及时回来汇报，我们写的书面调查资料，他都立即详细看，随即具体指示，布置用电话或文字通知区、乡，使全县抗旱工作进展迅速。

在生产抗旱中，县委、县府领导都分工深入区、乡检查督促，赵县长每次下去，都亲自到抗旱指挥部开具介绍信，他说“县领导下去也仍是指挥部派出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县后，他都要把下面见到的情况和办法向抗旱指挥部汇报，与一般工作人员没有区别。

三、四月份旱象严重时，隆昌河全部干涸，一区（即城关镇）组织街道居民、工商业户、单位淘河，县政府干部也划定锁江桥上面拱弯处一段，要挑去河内的淤泥，他在指挥部向我们谈：“动员大家淘河是好事，河内加宽，河床加深，蓄水增加，指挥部的同志必须主动参加，发号施令机关更要带头。”所以挑河时，他首先带头下河挖土，挑泥，完全如一个普通劳动者，使县府的同志们，越挑越起劲，大家都自觉多装快跑，使所划地段几天即完成。

春耕播种季节，稻田无水，播种困难，赵县长和我们多次研究后，特地专程走访老农民，商量办法。一天，他带领我与郭一去外西街老农民刘义顺家，他直捷了当的向刘请教：“田中无水，怎么播种，有无办法？”刘提出干田挖松，秒细，打窝点谷子，叫点“水杂子”，搞清粪水，长起后水来了，即薅秧，一样能获丰收。不几天，他又叫我同去四区（现龙市区）新龙乡生产村找老农民蓝昌全，问蓝：“稻田

无水、栽插困难，怎么办？”蓝昌全提出旱田、高瓢田改种红苕、荞子、毛稗等耐旱作物，还提出间套种方法。赵县长对刘、蓝二人所提办法，都很重视，要我们立即在电话上，向各区、乡介绍推广。当年这两种办法全县各地都认真采用，效果很好，这年虽然大旱，农业生产仍获丰收，较上年增产。

三区（现黄家区）、四区在电话汇报中有找地下水、挖泉水的事，赵县长看了记录，很重视，立即要我们收集找水源、找地下水的经验口诀，如“嘴对嘴，有泉水”、“弯对弯，在中间”等整理成书面材料，向各区、乡介绍推广。

1952年七、八月间，我随赵县长去蓝昌全互助组了解生产情况时，看见蓝分得的山坡土地、东一坨，西一块，既薄又小。赵县长便向蓝昌全谈：“这样又薄又小块的土地，庄稼怎么也长不好，以后你能不能把它搞厚点，搞大块点。”蓝昌全很受启发，当年冬天，他带领互助组，把田水放干，挑田泥上山铺土，于是成了大土、厚土，整个冬天，互助组家家的土都变大了，变厚了，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改土活动，附近区、乡的农民都来参观，《川南日报》也辟通栏介绍蓝昌全互助组变冬闲为冬忙的改土活动。次年，这些原来坡上瘠薄小土，遍种了良种“印度二九〇”甘蔗，每根甘蔗足有七尺以上，赵县长还为这些改土后的甘蔗照过像。

1952年秋收，我随他去五坡乡小湾子程华兴互助组时，他看见农民用“稿子禾”打谷子，抛撒散失的谷子很少，农民反映：“谷子挑回晒坝用‘稿子禾’打，比拌桶好，减少抛撒，多产粮。”回城后，他叫农林科与供销社商量，做点“稿子禾”架子，推广这种收获技术。次年，全县供销社都

准备了“稿子禾”供应，各区都有人使用这种方式秋收。

这年秋收后，他看见农民铲田坎上的草皮烧灰，这是我们隆昌农民的传统积肥方法，也是为小春田坎秋种作准备，他到科里来与我和郭一谈他看见的情形，问我们有没有好处，可不可以提倡，我们向他讲了这种传统烧伏灰方法的好处和意见，他很欣赏，叫我们下乡作典型调查，发出通知到区、乡，要求宣传推广。这以后，各乡铲草皮，烧伏灰，为小春播种广积土杂肥活动普及全县。

1954年，县贯彻《农业发展纲要》规划草案时，我们去胡家搞隆昌县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划调查，住区公所里，一天晚上大约十时左右，县委书记余盛渊同志打电话来，说“赵政委（即赵洪滔，已任县委书记）要去开会，叫我即将调查资料拿回给他带去开会。”当我走回城里南街县委会时，已是半夜过后。余说：“赵政委还在等你，他叫不用口头汇报，只把调查的原始资料给他就是了。”余并说“赵政委指示，你现在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洗澡，洗澡后立即睡觉，什么都准备好了”。第二天清早我起床后，才知赵一早已起身到泸州去了。

我们农林科（后为农业科）的几个一般干部，集中住在办公室坎下有水井那幢古老的木架楼房底脚，赵县长在未任书记前，也住在县府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我们房间来耍，有事向他汇报后，也能及时指导我们的工作。这种没有官架子的作风，很使我们感到亲切。

最使我难忘的是要我住院医病的事情，那是1952年秋，我和梁尚礼随同他去新龙乡了解蓝昌全、姚述华两个互助组的情况，当走到福庆乡木象冲时，我因疟气病复发，不能走

动，梁问我：“你做啥子？”，我说：“肚子痛”，他也转身来问我，我说“我有疝气病，蹲下肠子回到腹腔后就会好，不要紧”。不久好了，我们又继续赶路。事隔一年，1953年，专区人民医院迁来隆昌，新病房刚修好。一天，我们建设科正开区生产助理员会议，各区汇报，我作记录，赵县长叫梁尚礼送一张条子来给曾庆如科长，字条上叫立即停止我的工作，要我到他那里去，曾科长立即叫郭一记录，亲自送我去赵处，还未走到赵的办公室，他已在屋外阶沿等我，叫我马上到专区人民医院去医病。还说：“我与曾国谦院长研究过，你那个病不医要死人的。”当时我一再说：“我是好的，不医。”他不同意，叫科里派人送我去。于是曾庆如叫潘绍尊副科长亲自送我前往，当我们走到专区医院时，曾国谦院长已在球场边等着，一见面即说：“赵县长又来了电话，说已送来了，我们已把病床准备好了。”就这样，我在外科病房动手术，七天拆线后仍不让我出院。曾院长说：

“要经赵县长批准才准出院，你疝气好了，颈子上淋巴结核也是要死人的，赵县长叫把淋巴结核也医好才准走。”于是住院四十多天才离开医院。住院期间，赵县长到医院来看我两次。徐嘉陵副县长刚调来，他向徐谈过我住院的事后，徐副县长也亲自来院探视。赵县长对我的关心，使我感动，使我在以后工作中，从未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搞好工作。

1952年在赵县长的指导下，成立了隆昌兽医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他亲自到会作报告，张国平被选为协会主任。赵县长找他谈话，鼓励他好好工作，张很感动、兴奋。张被选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期中，赵县长曾找他交谈，征询他对全县畜牧兽医方面的意见，他提出

了冬季护牛和搞“白猪、牛圈”的意见。赵县长立即表示支持，鼓励他好好干，大胆地干。从此张国平处处都说：“想不到我这个牛太医，旧社会没有那个看得起，受人刁难，现在县大老爷跟我一起开会，商量县里的大事。”还经常说：“赵县长看重我，我只有好生干，才对得起他。”当赵县长帮助解决了兽医协会的房子后，张更加感激，常向兽医们谈：“赵县长关心兽医，我们兽医一定要努力为人民服务，才不辜负赵县长对我们的关心。”1978年张国平退休后，还经常回忆赵县长对兽医的关怀。

1992年12月17日

（注）本文由编者根据作者两篇来稿综合整理。

关心干部群众疾苦的县委书记徐永志

陈 清

徐永志同志是隆昌县第八任县委书记。他在隆昌任职时（1959年10月至1964年8月），经历了在大跃进后的生活困难时期。当时，我在他身边工作，县委办公室与书记室侧面相对，中间有一个小院坝，仅十米之隔。常见书记室灯光深夜不熄，他独坐在那里，吸着用叶子菸自制的杂拌烟，烟雾蒙蒙。时而就地踱方步，时而伏案疾书，记下思考的难题。上任不久，曾对我说：“隆昌是个农业小县，只有把生产搞上去了，才能改善群众生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嘛！”

徐书记生活简朴，工作深入，处处为群众着想。他很少时间坐在机关指挥，多数时间都在农村蹲点跑面，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一手材料，指导面上的工作。他常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能脱离群众。”他从不参加会议聚餐，不接受礼物，下乡先打招呼，不准闹特殊多弄菜，偶尔有违者立即受到严肃的批评。较长时间在新生、响石等地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累得全身大汗还谈笑风生。有一次在新生和平村试点瓜菜代回县的路上，他很有风趣的问我：“菜籽杆好不好吃？”我说：“有啥子好吃，咽都咽不下，为了填肚皮，是讲不来的事了。”他也说：“吃假了，我骑自行车

车都蹬不动。群众整天在地里劳动，比我们艰苦得多，要马儿跑就要马儿吃得饱，可见抓粮食生产的重要了。”1961年征购时，我在响石点上负责，将所调查的情况详细的向他作了汇报，说明实际产量与上报数有较大出入，征购任务负担太重，要完成征购就要伤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今后还要多返销粮食，那就是打柴卖，买柴烧，不图赚钱只图挑了。他沉思了片刻，说：“就与你们减一万斤的统购，可以了吗？”我回答：“差距还远。”“再减一万斤可以了吗？”他有些为难的说：“你要很好掌握，不能把种子卖掉。否则会影响来年生产。据我所知，是三个原因造成高征购：一是隆昌土改查黑田黑土时，查涨的田土面积有虚数，背了空背兜；二是耕地面积折合亩，隆昌是田4.215挑、土4.95斗折为一亩，毗邻县是5挑以上折为一亩，所以苗稼比我们差的，亩产还比我们高；三是产量的虚报浮夸。隆昌征购这个文章不好做。”我无言以对，敬佩他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这一年，全县征购实际完成数由往年的四千万斤左右下降到二千二百多万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徐书记在哪里，就要关心哪里的干部和群众。不只是问寒问暖，而是着重解决困难，讲求实效。当他了解到区、乡干部工作繁忙，工资收入少，困难较大时，立即找组织部研究，在1961年除常规的干部补助外，还将往几年干部福利费节余的七千多元挤出五千多元来补助困难较大的区、乡干部。胡家区委书记何沛然，家住城里，妻子在永达煤矿工作，心挂两头，为了使何能一心搞好工作，便与组织部商量，帮助安排何的妻子在胡家粮站工作，解除了何的后顾之忧。对被打成“右派”和反“右倾”下来的干部，他不是另

眼看待，而是同样亲切体贴。地委副书记崔璋，反右倾后被下放到隆昌凉亭乡罗星村劳动锻炼，徐书记曾多次前去看望。县委书记刘珍，反右倾后安排在县农场劳动，当农场场长陈先贵向我反映：“刘书记在农场病重了如何办？”我立即向徐书记报告，徐书记指示速送医院医治，由于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1962年响石区委书记夏吉奎点上的农业生产搞得出色，县委在那里召开了县委全委扩大会议，总结交流经验。我与夏同是龙市乡人，我俩闲谈时夏说出了奥秘，是平调了其他地方的人力和物力，集中使用在点上，因而庄稼生长茁壮。我持怀疑态度反问：“我们参观了响石镇周围一圈的苗稼都长得好，是何缘故？”夏回答说：“是先规划好了参观的路线，都作为重点来安排的。”我便下去核实，未照规划的路线走，是往纵深发展，了解到面上的生产很差，群众对平调的怨气很大，极为不满，便向徐书记如实汇报。徐沉住气，只是点了头，默不作声。待会议结束后，徐把夏留下来，在区委会开了一天有我参加的三人小会。徐心平气和的与夏促膝谈心，用算帐对比的方法，阐明搞点的意义、目的，点与面的关系，对点不能搞特殊，只能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搞好生产，不要顾点不顾面，抓住小面积丢了大面积，更不允许搞虚假和平调，伤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否则，是要犯严重错误的。徐对干部从政治上的关心和说服教育的苦口婆心，夏吉奎和我都深为感动，受益非浅。

1960年的夏天，是隆昌县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险期。干部、居民等非农业人口，每月只供应粮食十九斤，农民既无粮储备，又现粮少缺，较多的人吃的口粮都接不上早稻产新，因缺粮而患肿病者日益增多。在这饥饿与病魔交迫的紧

急关头，县委一班人心急如焚，除全力以赴下乡抓治病和生活安排外，还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县委生活治病办公室，专司其职。有一天，我的姐姐从福庆乡下专程到县来找我，含着眼泪诉说：“二弟，我从来都没有找过你，这次是迫不得已了，一家五口没有吃的，想找你借点粮食你们也没有，借点钱又从那里去买粮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活活饿死，只有求你在粮食局帮我买五十斤米皮糠，全家人都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向徐书记汇报了姐姐所说他家及村里缺粮、肿病的情况，徐沉思片刻，批条子同意了购买米皮糠，并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农村的问题严重，不能只看到你姐姐的一家，还应看到全县数以万计的大家，他们同样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要共同努力，抓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和治病。”

县委在春季狠抓了早熟作物的种植，扩大早稻、早玉米和瓜菜的种植面积，充分利用作物稿秆，大力推广代食品，也未扭转夏季缺粮局面。向省上求援吗，全省都粮食告急。省委果断决定：各县、市的国家粮食，除军需粮外，一律不外调，由当地自行安排，不受返销指标的限制。其实在我县就是有了返销指标，也无粮可供。这时，可把县委徐书记难坏了。为了应急，他亲自领导生活治病办公室，指挥战斗，亲自掌握情况，下乡巡视，整天忙于城乡奔驰，督促落实补救措施，行动差的就要寻根究底，通宵战斗，已习之为常。有一次地委紧急电话会议结束，已是深夜两点，他一面立即召开区、乡电话会，传达贯彻地委指示精神，一面又耽心下面未作好记录，叫我将地委电话会议记录整理出来，次日专人送到区、乡。时间紧迫，已来不及抄写，我怕贻误工作，就把打字员郭仕科同志叫起来，我一边念记录，他一边

就打字，真有“只恨达旦甚速，敢云遥夜何其”之感，完毕时已旭日东升。徐书记一夜未合眼，开完区、乡电话会后来到我的身边，见已完成任务，安慰我说：“你熬了夜，准你休息一天。”我虽然未休息，但已感受到领导的亲切关怀。

徐书记为群众生活治病绞尽了脑汁，除想法供应农村一部份黄豆和饮食店出售用少许黄豆、大米制成的“营养羹”外，还多次召集分管财经的副县长赵永昌、粮食局长张汉儒到县委研究，把县里仓库仅有的粮食几次挤出来供应农村。非农业人口供应了一次高粱，是一斤抵一斤算的，以后上面通知只能折为0.7斤贸易粮来供应，应该补差的粮食挤了出来解决农村的问题。但对要挤供应城镇人口的库存粮，张汉儒最为耽心，怕早稻收不起来，断了城镇的粮食，会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经过反复做张的思想和精打细算，最后挤出的一批粮食，按我们所掌握的缺粮人数计算，平均每人仅五斤，数量虽小，是用在青黄不接的刀刃上，却帮助了大批农村群众度过了生活难关，抑制了肿病的恶性发展。

1964年8月，徐书记调离隆昌后还时刻惦记着隆昌的干部和群众。文化大革命期间响石有个小学教师去宜宾求见，徐因正受冲击，未曾会晤，感到内疚，事隔几年还写信给我，要了解那位老师的通讯处，便于说明原委，以表歉意。徐在宜宾曾患严重脑血栓，口哑不能言语，完全丧失记忆，经过医治，逐步好转，当他恢复记忆回思往事时，就回忆起在隆昌共同工作过的干部和群众，要我转告他的思念。

徐永志书记虽然早已调离隆昌，并已于1991年4月在泸州病逝，但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1992年5月

唐朝选先生事略

唐传英

1992年12月24日，唐朝选先生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一生勤奋，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勇于追求真理，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为民族独立不惜洒热血，为祖国统一不怕陷囹圄，积极参政议政，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教育事业更是倾尽一生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唐朝选先生的一生，也许是平凡的一生，没有高位显爵，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正是他以千万个平凡的、孺子牛式的辛勤努力，成就了他高尚的、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一生，令我们永远难忘。

唐朝选，字鸿，1914年2月5日出生在四川省隆昌县高峰乡。父亲唐进爵，母徐氏。父亲是一位算帐先生，收入不多，九岁时母亲去世，生活更为困难，其妹唐朝敏寄养于姑母家，唐朝选也只得在族亲家寄食，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后来得他父亲的一位同事资助，才于1930年7月毕业于隆昌县立初级中学男14班，时年16岁。旧中国苦难的社会环境和贫困的家境使他更加勤奋好学，深受“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在初中毕业后，满怀雄心壮志，步行几百里到成都去投考求学，同时被高中和艺专录取，但迫于经费无着，不能入学，于是，他步入了教师队伍。

1931年，17岁的唐朝选入隆昌城区第二小学任教，教

音、体、美、劳四科，兼作班主任。初为人师，他很善于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曾从学校的“大唐”老师每天早晨练习书法，一面磨墨，一面埋头读帖，坚持不懈，也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直至晚年他还常常念叨这件事。

在教学上，唐朝选他的进步思想来教导影响学生。他教学生唱《伏尔加船夫曲》等进步歌曲；为破除迷信，他带领学生探“龙洞”，告诉学生“久旱不雨不是龙王作怪”；为了锻炼学生体质，他组织学生郊游、爬山、比赛；他反对“鞭笞教育”，在兼任县儿童福利委员时，他发动儿童散发传单，向社会呼吁，向县长请愿，提倡并在他的教学实践中始终贯穿了“以爱的手段来教育孩子”的教育思想。那时对学生的体罚普遍存在，罚站、罚跪、饿饭、打手心、打屁股等。他的主张是不能轻易被社会认同的，受到校长的公开指责。唐朝选愤然去职，他的学生轮流值班守住他，也挽留不住。

离开县城二小后，唐朝选先后在县女中、三小、一女小作体育教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采取了一连串侵略行动。青年唐朝选义愤填膺，带领学生上街张贴标语，向民众宣传“民族危亡关头，要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又组织学生演出他编导的歌剧《济南血》，演唱《父亲前天杀死了》等歌曲，惨烈感人，观者莫不垂泪。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青年胸膛，祖国国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我山河”这些口号响遍全国。唐朝选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投笔从戎，上抗日前线。时国共两党已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他原拟去延安，但在

成都错过了联系的机会，就投考了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被录取在14期6总队步兵科学习。

由于部队急需补充兵源，他只学了一年半，便提前于1938年毕业，分配到15补训处任少尉连附，训练新兵。1939年7月带兵入黔，编入99军99师。唐朝选待兵士如兄弟如学生，训练新兵时，用爱国主义思想来教育说服不懂纪律的新兵，而不是打、骂和关禁闭。除耐心做说服教育工作外，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教新兵读书写字，带领大家种菜捕鱼补助伙食，不但不吃缺自肥，反而有节余上缴，曾使军中舆论哗然。为了在短时间内训练出合格的战士，以应前线战事之需，他把总理遗嘱、黄埔校训、军人守则、抗日要求、操典提纲、作战技术等编写成图文并茂的成套挂图，在实际训练中效果良好，得到上级表彰，并印发到全师各营连当教材。他带的部队没有逃兵，人称“带兵不跑的唐连长。”

1939年12月，唐朝选参加了桂南会战，隶属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所部第99军，反攻昆仑关，激战四塘、五塘、龙凤岭，大战日军第5师团今村中将部队。1939年12月31日夺回昆仑关，1940年再度失守，2月24日，中国军队第二次占领五塘和昆仑关等战略要地。唐朝选奋勇作战，弹片伤身十余处，有的弹片四、五十年后才取出。这次战役他荣获干城乙等奖。之后，唐朝选随部队到湖南练兵。

1941年9月18日，武汉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唐朝选参加了湘阴、麻石山等战役。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又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率部进攻第九战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99师固守湘江东岸阵地，并派一部向栗桥、福临铺攻敌侧